

当代工会干部必修丛书



高铁生、张晶 著

51
苏联、东欧国家
经济改革今昔

工人出版社

当代工会干部必修丛书
苏联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今昔

高铁生 张晶 著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安外六铺炕）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昌平长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4 字数：86000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3,352册

ISBN 7-5008-0271-4/F·14 定价：1.30元

序 言

罗 干

一场全面改革的冲击波，在我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以至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引起了强烈的震荡，也将中国工会推向了一个新的挑战 and 严峻的考验面前。

以往的认识，传统的观念和长期积累形成的经验，将重新接受检验和评估。在这场冲击之下，认识在深化，观念在变革，知识在更新。一切新的东西都在创造之中。

这给工会干部提出了一个紧迫而又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任务：加强学习，以改革时代的新的标准和要求，努力提高自身的政策理论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

虽然，我国工会具有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革命传统和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特别是近几年来，广大的工会干部继承和发扬好的传统，不断提高业务素质，积极探索和发展新的经验，在改革和开放的新形势下，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应该说，基本上形成了一支积极热情、奋发向上、有着较好素质的工会干部队伍。

但是，我们同时还必须清醒地看到，目前我国正处在深刻变革的年代，新的体制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不可阻挡之势迅速发展，适应社会进步趋势的新思想不断产

生，十亿人民正在进行着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创造性事业；当今世界，新的技术革命蓬勃兴起，人类文明在突飞猛进，马克思主义新的大发展已经成为现时代的大趋势。在这样的国内国际环境中，适应伟大变革和发展的要求，工会工作必须不断开辟新的领域，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会发展的新道路。

广大工会干部如何能够以崭新的姿态和自信的力量，勇敢地站在改革浪潮的前列，承担起这光荣的历史重任呢？仅靠我们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已经远远不够了；必须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扩大新知识；必须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现代科学技术文化知识。这已经成为我们最迫切的需要。

近几年，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工会工作取得了新的重大发展。在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基本方针指导下，工会工作逐步深入到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广阔领域；工会组织作为亿万职工群众的代表，参与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经济文化事业的管理，日益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明确指出，工会要代表职工群众的利益，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积极参与社会协商对话、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根据这样的形势和任务，工会干部不仅要熟悉工会的业务，而且要熟悉经济，懂得现代管理知识，以及尽可能了解一切与我们工作范围和工作对象有关的新的知识。在当前，还尤其要学习和领会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不这样，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做到关心全局，也很难真正投入改革实践之中，甚至不可能做到深切和真实地体察职工群众

的思想意愿。这样的工会组织，将无力代表职工群众，无法参政议政，对国家经济社会政策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因而也就谈不上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全面提高工会干部队伍素质，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在继续加强各类专业培训的同时，应该大力提倡广大工会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勤奋读书，自学成才。为了帮助大家自学，工人出版社编辑出版了这套广泛介绍当代各类新知识的丛书，希望它能够得到工会干部们的喜爱。

我们相信，只要全国工会干部树立改革、创新的志气和决心，面向现代化建设和改革，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努力学习，不断提高，就一定能以新的面貌和新的知识，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建树新的业绩。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酝酿与准备	3
第一节 旧体制弊病逐渐暴露	3
第二节 改革的政治条件初步具备	9
第三节 经济改革的理论准备未雨绸缪	12
第四节 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经济改革序幕	17
第二章 起步和发展	27
第一节 苏联经济改革的起步	27
第二节 南斯拉夫经济改革的继续	31
第三节 匈牙利经济改革独辟蹊径	34
第四节 其他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	39
第五节 苏、南、匈三种模式初步形成	45
第三章 探索和曲折	51
第一节 苏联经济改革步履艰难	51
第二节 南斯拉夫在自治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新探索	55
第三节 匈牙利在国际政治经济逆境中推进改革	59
第四节 其他东欧国家经济改革的探索与曲折	64
第四章 调整与深化	71
第一节 苏联东欧国家对经济改革进行“反思”	71
第二节 各国对经济改革进行调整	77

第三节	苏共二十七大开辟经济改革新阶段·····	84
第五章	共性和规律·····	92
第一节	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相容共处·····	92
第二节	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紧密结合·····	96
第三节	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互相促进·····	101
第四节	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结合·····	109
第五节	正确对待利益的一致与差别·····	115

《苏联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今昔》

前 言

当今，无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兴起改革之风。从改革中求生存，从改革中求发展，已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历史潮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改革又是不同社会制度在世界舞台上的一场新的较量，因为归根到底，谁能通过改革为新的科技革命和生产力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谁就能主宰二十一世纪。

向西方学习，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改革中汲取有益的东西，在我国改革和开放的今天，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比较地说，对我们更有直接借鉴意义的，是苏联东欧国家经济改革的经验和教训。

众所周知，战后绝大多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都曾以苏联的经济管理体制为楷模，建立自己的经济体制。我国也不例外。当然，在我国改革前的经济体制中，还带有某些供给制特点和封建自然经济的影响。但是，其基本框架和苏联传统经济模式并没有本质区别，都是以排斥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为特征的，高度集中和僵化封闭的经济管理体制。由于改革的出发点接近，面临的任务相同，因此，苏联东欧国家经济改革的成败、利钝、得失，对于我们来说，绝不是无关痛痒的。他们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都可以成为我们镂金琢玉的“它山之石”。

不仅如此，苏联东欧国家在经济发展阶段上也和我们比

较接近，商品经济都不十分发达。他们在推进和深化经济改革时，受现实的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也必须把改革和发展很好地结合起来。他们为此而采取的许多实际步骤，对我们会有启发。

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比我们起步早，历史长。他们走过弯路，经历过反复，积累了不少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这些国家改革历史提供的纵向比较，有助于我们认识经济改革的内在规律性，可以帮助我们少走弯路。

同时，由于这些国家改革的指导理论和具体实践各不相同，形成了几种各具特点的改革模式。它们之间的横向比较，既反映出经济改革的“一般性”，也反映出各国经济改革的“特殊性”。这对我们把握经济改革的大方向和探索本国改革的特色，是很有益处的。

最后，苏联东欧国家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方面。建国以来，我国同这些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一直没有间断，尽管“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经一度下降，但近几年又渐趋活跃。今后，随着对外开放的进展，我们同苏联东欧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往来，会越来越多。为了推动这种关系的发展，我们应当增进对这些国家的了解，包括对他们改革历史和现状的了解。

本书试图把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做为一个整体，以跨越不同年代的三次改革浪潮为主线，辅以对有代表性的国家进行比较，来加深读者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必然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的认识；并以苏东国家经济改革为背景，认识我国经济改革的特点，以便更加自觉地投身到改革的浪潮中。

由于篇幅所限，对苏联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的一些理论问题，本书不拟详细介绍，而只作通俗解释和概括说明。

第一章 酝酿与准备

从总体上看，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发轫于本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但是，在此之前，改革经历了长期的酝酿与准备。这是因为旧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病有一个暴露过程。人们的认识要经历一个深化过程。经济改革所需要的理论准备和政治条件，也要有一个积累过程。

第一节 旧体制弊病逐渐暴露

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前的经济管理体制曾经赢得过人们的普遍信任。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爆发过一场空前严重的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它使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从比较中认识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对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计划经济制度充满好感，寄以希望。二次大战后，一系列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效法苏联的经济管理体制；不少民族独立国家也热衷于“国有化”、“计划化”；甚至连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也把自己的一些宏观经济管理措施，标榜为“计划经济”。战后初期，苏联东欧国家也的确借助于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比较快地医治好战争创伤。一直到五十年代初期，这种经济体制显示出了它在战时和准战时时期的适应能力和优越性：便于集中全国现有的人力、物

力、财力，服务于特定的目的；可以使整个经济过程简单化，有利于统一指挥，划一行动。

但是，当战后经济恢复时期结束，经济建设全面展开，工业部门交叉林立，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经济联系日趋复杂时，原有的经济管理体制越来越显得呆板、笨拙，与新的历史条件不相适应了。

在苏联，最初也是最直接揭示旧经济体制陷入危机的信号，是一连串无可辩驳的数字：

	1951—1955年	1961—1965年
	平均增长率（%）	平均增长率（%）
国民收入	11.5	6.6
工业总产值	14.8	8.6
生产资料平均增长率	13.8	9.6
消费品增长率	12	6.4
农业总产值	3.9	2.3
工业劳动生产率	8.2	4.9
人均实际收入	7.2	3.6
商品零售总额	13.5	5.9

旧体制运转不灵逐渐在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明显地表现出来。

在计划管理方面。决策权高度集中，管理机构重叠，造成很大的失误。苏联计划机关掌握着计划审批权。大企业或重要企业的年度、季度甚至月计划，都要计委审批。一般企业的年度、季度和月计划，也要由中央有关部门审批。企业制订计划要依据国家计划机关下达的指令性指标。这种指标，战后最多曾达到120项。战后逐渐减少。到五十年代末，还有二、三十项之多。六十年代，国家发展国民经济的年度

计划总共有几十大本，几千多页，几十万个数字。国家集中管理的产品目录包括13,105个项目。大到联合收割机、轧钢机，小到啤酒商标、钓鱼钩，都由计划机关安排生产。按照苏联著名经济学家诺沃日洛夫计算，苏联国民经济资源分配可供选择的方案，总数达 10^{500} 次方。这些比迄今科学所知的天文数字还多的计划方案，要多少人才算得出来呢？曾经有人粗略估计，即使吸收现有的全部苏联公民参加这项工作，也难以胜任。等到人们终于推出一种理想方案时，早已时过境迁，需要重新计算最佳方案了。显然，这样的计划，国家计委是力不胜任的。

由于任务庞杂而计划机关能力有限，造成失误的事例比比皆是。比如，在西伯利亚安加河畔，按国家计划修建了一座很大的水电站。但是，当电站建成时，还不知道究竟要向哪些单位供电。众所周知，苏联为解决居民住房问题，下了很大的功夫。可是，当许多幢楼房拔地而起时，却发现没有澡盆。由于这样一些“配套”件供应不足，大批楼房不得不延期交付使用。

计划机构臃肿重叠，审批手续繁琐复杂，也往往贻误生产，有碍建设。苏联企业经理要想生产一种新产品，必须上报上级计划部门审查批准。但是，公文旅行，久拖不决，等到计划批复下来，这种产品在市场上早已过时了。

在价格管理方面。价格形成缺乏根据，价格一旦定下来，长期不变，企业没有价格决定权，不利于资源合理配置，导致重大的经济比例失调。苏联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是由国家价格机关制定的，而且往往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固定不变。这种价格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不能合理引导生产和消费。比如，苏联的土豆和面包价格长期未变。

以至于在农村，用面包喂猪的现象相当普遍。苏联的房租、地铁票价也是几十年一贯制。在苏联经济改革前，农产品价格低到十分荒谬的程度。如1953年时，谷物义务出售价格只及成本10%，牛肉5%，猪肉6%，牛奶12%。一些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还抵不上从农庄到收购站的运输费用。由于这种不合理的价格政策，农业生产受到沉重打击。1953年与1940年相比，苏联谷物产量减少13%，肉和奶的产量增长也十分缓慢，在长达十几年中，肉只增长24%，奶只增长8.4%。

由于苏联重工业产品不征收周转税，造成了价格低廉的假象，很不利于节约原材料。由于一大部分纯收入转移到最终消费品中去实现，使比较轻、重工业的效益失去准绳，不利于对调整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做出正确决策。同时，在价格形成方面过份强调以生产费用为依据，这也就鼓励生产者使用贵重材料，导致浪费严重，比例失调。在苏联尽管国家一再强调要按计划生产，不许破坏产品品名表，但是，苏联企业还是挑选价格对自己有利的产品进行生产。以至于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一些产品经常出现严重短缺。为克服某些产品的匮乏，苏联政府不得不经常号召进行突击。勃列日涅夫也曾不得不大声疾呼：“小物品，如最普通的肥皂、洗衣粉、牙刷、针线、婴儿包布及其它轻工业品的短缺是不能原谅的。”

在物资技术供应体制方面。国家物委包揽几十万企业供销，脱离实际地搞统一调拨，常常使产销脱节，造成巨大浪费。苏联国家供委要把近20亿种生产资料在几万甚至几十万个企业之间进行统一分配。由于组织工作十分复杂，工作量过于浩繁，使这种分配效率低下，漏洞百出。企业常常被迫舍近求远取给原料或设备。调拨量不能均匀到达，在型号规格方面

也不能满足要求。企业从申请供货到得到所需要的物资，常常要经过几十道关卡，在企业及有关领导部门之间几十次、乃至上百次奔波。这就使得企业被迫超定额储备，加剧某些产品的短缺。据统计，1965年10月苏联有27亿卢布的物资从经济周转中转入超定额库存。在1966年苏联商品物资储备占用了1020亿卢布流动资金。苏联报纸披露，在乌克兰梁赞市附近有一个大工地，那里的几台波兰造的挖土机的齿轮坏了，换部件的费用顶多不过250卢布，可是，工地无权直接从波兰订购新部件。负责这项工作的总工程师只好到莫斯科拜会有关部长，经过他们的批准，才发出订货单。直到两个月后，这一部件才运到工地。在此期间，整个工地停工了。苏联企业有时为了减少这种经济依赖，不得不追求“大而全”、“小而全”，自己生产所需要的一切，阻碍了专业化和协作的发展。

同时，对企业经营成果的考核体制和生产资料、产品统购包销的流通体制也使企业不关心市场的需求，不担心市场上的销路，只要完成计划指标，不顾产品的质量、规格，甚至不惜粗制滥造，以次充好。这就使大量产品积压在流通领域中。据一份调查报告讲，苏联每年增产的鞋袜达几千万双，但由于货不对路，只好压在仓库中。在苏联，超短裙曾时兴一阵子，于是超短裙的生产大发展。可是，后来超短裙不流行了，商品存货已卖不出去，但工厂还在继续大批赶制。在改革前，苏联滞销商品中，衣料约占一半。1959—1963年成衣库存增加了两倍，1964年零售商品网中积压的次品库存额（除食品外）接近200亿卢布。一方面是某些产品脱销断档，一方面是某些商品大量积压。这已成旧体制的一个突出的特征。

在没有市场竞争压力的情况下，企业安于沿用老技术，生产老产品，轻车熟路，少冒风险。因为如果采用了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就会在一定时期减少产量，影响奖金和利润。而且，采用新技术、生产新产品，往往要层层审批，迁延时日，一个环节阻塞，新产品就会夭折。企业就会虚掷人力，枉费资金，得不到应有的补偿。正因为存在上述情况，“工厂大门象大坝一样堵住车间，不让新技术进去。”有一个突出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连续铸钢法本来是苏联首创的。后来，28个资本主义国家从苏联买去专利。使用此法铸出的钢锭、钢坯质量好，具有高度的均匀性，制造出来的机器部件强度稳定。由于金属结构安全系数可以相应降低，还能大大缩小金属结构的体积。但是，奇怪的是，苏联自己用这种方法浇铸的钢坯不到10%，而西德、意大利、日本却达到1/3。“奥妙”就在于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钢坯，无论在国外国内市场上都要面临剧烈的竞争。而苏联的钢铁企业产品直接由计划机关调拨，无须经过这种“惊险的跳跃”。

旧体制种种积弊给国民经济造成了惊人的损失。据苏联卓越的数学家列·康托罗维奇估计，中央制定价格制度的偏差和工作效率不高的现象，大约使总产量下降了1/3。美国经济学家阿·曹伯曼认为，由于苏联计划工作疏漏造成的损失，约等于1/4到1/3的潜在数量。

战前、战争期间和战后初期，国内外的特殊的历史条件，使旧体制还多少能够披挂上阵，抵挡住资本主义的挑战，使其固有的缺点不易显现。而当特殊的历史条件消失时，旧体制的弊病就逐渐暴露。早在五十年代初，苏联国家就开始某些局部改革，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大规模改革已势在必行。

第二节 改革的政治条件初步具备

早在六十年代中期大张旗鼓改革之前，苏联东欧国家不少有识之士，已经发现传统经济体制的种种缺陷。他们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改革建议。但是许多真知灼见并没有被采纳。这其中固然有认识上的原因，有特殊的历史条件的影响，但是不能不承认，政治条件不够成熟，也是改革建议被打入冷宫的重要因素。因此，启动经济改革的车轮必须减少政治上的摩擦力。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经济改革所必要的国内外政治环境逐渐形成。这表现在：

第一，破除个人迷信。苏联三十年代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是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是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具体实践。由于在苏联几十年的政治生活中，甚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弥漫着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因而传统的经济体制也往往被视为完美无缺，不容变革。在斯大林时代，如果有谁侈言改革，就会在党内斗争中遭到清洗，甚至受到保安机关的审讯乃至迫害。新经济政策后期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经济理论方面，有过不少独到的见解，至今对我们仍然不乏启示。但是，当年却不被见容。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和政府领导人沃兹涅先斯基，也是由于在经济工作中提出一些实事求是的意见而罹难的。可见，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以及斯大林在政治上的跋扈，严重束缚着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正视和解决本国经济体制方面积累起来的问题。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了。传统体制的政治支柱，开始倾斜了。1956年，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报告尖锐地批判了斯大林骄傲自满、独断专擅，高踞于党和人

民之上，把自己变成绝对正确的化身。这一批判尽管在当时引起某些国内外的混乱和困难，但在政治上起到拨乱反正的作用。它冲破了苏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长期存在的个人专权、一言堂、家长制等破坏党内民主的局面，推动了法制建设；在思想上，它使人们冲破教条主义的严重束缚，一改理论界亦步亦趋地重复、诠释斯大林观点的陋习陈规。它的积极作用之一，就是人们不再套用斯大林的公式，而是实事求是地去总结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成败得失，去评判本国经济体制的利弊优劣。

第二，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不断尖锐化的理论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党内生活不正常，保安机构擅权，法律秩序被漠视，以及产生大量冤假错案的直接原因。许多政治上的过激行为都是在阶级斗争，甚至在对敌斗争的名义下进行的。这种政治上的紧张气氛也压抑人们在经济上变革图新的积极性。

赫鲁晓夫上台后宣布，在苏联国内敌对阶级已不复存在，因而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已经结束。与此同时，东欧一些国家党的领导人，也公开宣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已没有在利益上同社会主义相矛盾的阶级或较大的阶层；社会主义的利益和共产党的目的并不是阶级斗争尖锐化，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时期已经结束。对阶级斗争的正确估量，无疑使经济建设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基于这种阶级斗争观念，政府很自然地不会主张用专政手段和行政办法来解决意识形态分歧，保安部门理应退出纯属政治、经济和学术方面的争论。这就使人们敢于提出各种关于建设和改革的设想。

第三，重新认识波匈事件。1956年6月28日，波兰波兹南工人群众不满于自己的要求受到漠视，走上街头示威游